

遵义市历史文化

2014年1-4期

(合订本)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主办

2014年第1期

总第37期

遵义

历史文化



遵义会议背后的故事 ■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早期实践 ■

正安文史四题 ■

感悟《群书治要》 ■

UNYILISHIWIWENHUA

2013年会珍影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名誉会长：谢培庸

顾问：丁福秋 王羊勺 王道金 卢开祥 张明辉 杨祖恺
陈福桐 幸必达 赵福田 黄万机 谭剑锋 黎代琼

顾问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遵义历史文化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遵义历史文化》编辑部

主 办

贵州乡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协 办

2014年3月16日 出版

2014年第1期
(总第37期)

第一阅读

远 近 / 读一点文学…………… (001)

长 征 学

费侃如 / 遵义会议背后的故事…………… (004)

禹明先 / 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 (009)

历史回声

钟永玖 /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早期实践…… (017)

黄光荣 / 伟人诞辰话伟人…………… (025)

地史余韵

罗遵义 / 正安文史四题…………… (027)

史崇高 / 一湾秋水一湾月…………… (033)

钱再伦 / 一路行来一路诗…………… (038)

名郡人物

何其荣 / 刘伯庄与遵义教育…………… (042)

王玉桂 / 恩师王永康周年祭…………… (044)

会 长：曾祥铨

副 会 长：田兴詠 谢尊修 王 刚 黎 铎 林茂前 王现璋 葛镇亚

秘 书 长：王现璋（兼）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玉屏路4号 邮编：563000 电话：0852—8232635

投稿邮箱：zylswh001@163.com

地方物事

周开德 / 闲话青龙寺……………（048）

饮食文化

文博豪 / 汤鲜味美盐子鸡……………（051）

地名文化

常 言 穆升凡 / 遵义两个代管市……………（052）

常 言 史崇高 / 黔北两个自治县……………（057）

娄山语林

汪孝杰 / 感悟《群书治要》……………（062）

短讯快报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3 年会召开……………（037）

新会员名单……………（041）

长征学学会成立……………（056）



主 编：林茂前

葛镇亚

副主编：胡长斌（常务）

游平伟

文博豪

编 委：钟永玖

王正义

穆荣海

郑希有

篆 刻：周树心

遵义历史文化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读一点文学

○ 远 近

曾经，以为有了钱财，就可万事大吉；以为有了市场经济，就可创造一切。可是，当一些人“被致富”后，这些人便“富”得只为明天的生计发愁；当一些人赚到钵满盆溢时，这些人便“穷”得只剩下钞票了。于是乎，官无信，医无情，师无德，商无诚。斯时矣，社会不想急功近利，都演绎成奢望。

那末，还有甚么可以抵达心灵？

读一点文学吧。

何为文学？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是这样定义的：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后又列举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样式，以说明“文学”之有别于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别样的艺术。

其实，关于文学，最权威的说法据称有七十余种，泛泛而论的，则近两百种。由此可知，文学之富，富在内容上的不断变化和形式上的推陈出新；文学之繁，繁在自然界的物象多端与人类社会的事由万千，而人力难予抵达，知见难以尽囊，慧识难以言说。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文学的表述，文学有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表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因为文学是由语言文字而非其它材料建造的。譬如孔子编定的“诗三百”（即《诗经》），除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无可撼动的开山之功外，《诗经》本身还是一部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官家语汇与民间话语之大成，一部最早的古汉语文字之集成。《诗经》的高度，至今令人仰望。

第二个层面，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因

为它形象化地反映了客观现实。所谓形象，可谓文学专利，即以语言文字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且能够诱导人类思想情思的生活画图与物事场景。譬如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中，大观园的生活画面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可以激发不同时代读者的情感；宝玉与黛玉、宝钗的爱情悲剧，深藏着封建社会末期整个社会的全部密码。《红楼梦》关于生活、生存、生命的关怀，至今无人能及。

第三个层面，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因为它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反映的现实，往往比现实更有典型性，因此更具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人类社会离不开文学的缘由所在。所以，真正的文学不是深闺的花瓶，不是权贵的摆设，不是历史的戏说，不是崇高的消解。亦非艳词丽句，轻慢乖张；蝇营苟苟，喋血疯狂。真正的文学，应该成为：对邪恶的抗争，《诗经·国风》如是，《水浒传》如是，鲁迅杂文如是；对生活的至爱，屈原如是，泰戈尔如是；对理想的向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是；对人类想象力的提升，《西游记》如是。

就个人而言，读不读文学，无关乎社会，只关乎自己。可是，当一群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度不读文学时，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浅薄浮躁，见利忘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此之谓也。

斯时矣，能够浸润人心的，惟文学矣。

真正的文学，便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反之，只是一个“伪”字。

读一点文学吧。为己，为他，为社会，亦为明天。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名誉会长：谢培庸

顾问：丁福秋 王羊勺 王道金 卢开祥 张明辉 杨祖恺
陈福桐 幸必达 赵福田 黄万机 谭剑锋 黎代琼

顾问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第一阅读

远 近 / 读一点文学..... (001)

长 征 学

费侃如 / 遵义会议背后的故事..... (004)

禹明先 / 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 (009)

历史回声

钟永玖 /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早期实践..... (017)

黄光荣 / 伟人诞辰话伟人..... (025)

地史余韵

罗遵义 / 正安文史四题..... (027)

史崇高 / 一湾秋水一湾月..... (033)

钱再伦 / 一路行来一路诗..... (038)

名郡人物

何其荣 / 刘伯庄与遵义教育..... (042)

王玉桂 / 恩师王永康周年祭..... (044)

《遵义历史文化》编辑部

主 办

贵州乡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协 办

2014年3月16日 出版

2014年第1期
(总第37期)

会长：曾祥铨
副会长：田兴咏 谢尊修 王 刚 黎 铎 林茂前 王现璋 葛镇亚
秘书长：王现璋（兼）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玉屏路4号 邮编：563000 电话：0852—8232635
投稿邮箱：zylswh001@163.com

地方物事

周开德 / 闲话青龙寺……………（048）

饮食文化

文博豪 / 汤鲜味美盐子鸡……………（051）

地名文化

常 言 穆升凡 / 遵义两个代管市……………（052）

常 言 史崇高 / 黔北两个自治县……………（057）

娄山语林

汪孝杰 / 感悟《群书治要》……………（062）

短讯快报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3 年会召开……………（037）

新会员名单……………（041）

长征学学会成立……………（056）



主 编：林茂前

葛镇亚

副主编：胡长斌（常务）

游平伟

文博豪

编 委：钟永玖

王正义

穆荣海

郑希有

篆 刻：周树心

遵义历史文化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遵义会议背后的故事

□ 费侃如

“张王橘谈”

中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耿飏，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90诞辰座谈会上，曾谈到党史界前所未闻的一个细节：中央红军黎平会议后继续向西前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境，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也就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据考证，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的时间，是1934年12月20日，正是黎平会议后的第三天。

耿飏当年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的长征中很多重要战役，四团都是前卫团。在强渡乌江前，张闻天、王稼祥橘林谈话情况是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总参谋长

刘伯承分别告诉他的。

过去人们只知道张闻天曾经是王明“左”倾宗派集团的重要成员，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却不知道这个人物在关键时刻站到毛泽东正确主张一边，对推进遵义会议的成功，起到过特殊的历史作用。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军内具有一定的实权，也是“左”倾集团的成员。通道、黎平会议正是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下，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才得以被大家采纳，从而否定了博古、李德、周恩来最高“三人团”原定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这时周恩来已开始站在毛泽东、张闻天一边，而博古、李德并不甘心放弃他们去湘西的计划。他俩的主导思想是，只有到了湘西根据地，放下包袱才好打仗。部队虽然脱离了蒋介石设置的罗网，向西进军了，但博、李随时想着如何返回湘西。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黎平政治局会议虽然在战略总方针上，暂时“决定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就是说，待部队到达遵义后，中央根据敌我态势，再研究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因此，今后党和

遵义会议史话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红军的前途，充满着各种变数和凶险，稍有闪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只要博古、李德还继续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张闻天开始考虑更换军事领导的问题，他和王稼祥的橘林谈话，即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想法。

这就是有 20 多人参加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由来。

怎样才能更换军事领导呢？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一是中央政治局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长征出发后的一些教训。没有涉及人事变动问题，也不开扩大会议。“张王橘谈”传开后，红军高级将领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商谈后，为了让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认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丢掉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教训，才能使党和红军的高层觉悟到，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继续指挥下去了。并由张闻天起草一份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提纲，到遵义后提交给会议讨论。毛张王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同意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作为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正因为有“张王橘谈”在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中形成了支持拥护毛泽东的良好舆论氛围，所以当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后，博古按原定计划准备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向博古建议：“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众怒难犯，只好同意了。1935 年 1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驻地举行。博古虽对增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议题未与他商量而很不情愿，还是服从常委决定作了一个初步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最后还是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周恩来在军事副报告中，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接着张闻天作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就使得会议在讨论发言之前，有了正确的导向，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须知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等相继作了重要发言后，整个会议形成批评博、李错误“一边倒”局面。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更换军事领导人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会议最后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扩大会一结束，中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博古会后不久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李德从此不再拥有军事指挥话语权。

因议论红军长征战略方针的一次“张王橘谈”，而引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更换军事领导人，体现了中央见微知著的判断和值得提倡的领导方法。当然，这也不是“张王橘谈”灵机一动所致。此前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已牺牲了上万人的年轻生命，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

遵义历史文丛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至三万余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因此，召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实为情势使然。“张王橘谈”只是为会议更换中央军事领导人作了舆论准备。正如耿飚在座谈会上发言时指出的：“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周博长谈”

遵义会议结束后，被大家批评的李德主动提出到一军团待一段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便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会上被批评的博古仍与中央队的同志一起离开遵义向北行进，但大家看不到原先他那朝气蓬勃的身影，也听不到他高声谈笑的声音。一路上他深思不语，不思茶饭，郁郁寡欢，骑着马跟着队伍走。这些天来，遵义那几天会议的情景，总是萦绕在博古心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突围以来受到了重大损失，同志们对此说些尖锐的甚至偏激的意见，自己虽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作为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领导人，是可以接受的，并在会议结束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对反“围剿”失败，身为党的总书记，应负主要责任。可是，周恩来把原定总结长征以来的教训，未经商量就改变成总结反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洛甫（张闻天）的“背叛”和有准备的发难，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态度和

尖刻的发言等，这些过去的亲密战友、同学和同事为何突然这样对待自己，就使博古困惑不解了。

土城一战受挫后，遵义会议原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又充满着变数和凶险，靠博古目前的精神状态，再领导下去是困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几人在一起商议时，洛甫明确提出是改换党的领导人的时候了；但博古在政治路线上是紧跟共产国际的，遵义会议对六届四中全会后党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就很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罢免他的理由。同时，现正处于紧急的战争环境，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十分重要，一定要维护六届五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只能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上作调整。因此，即使博古不做总书记，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今后还要在一起共事，所以对博古只能说服，不能硬来。1935年2月初，红军向云南扎西地域进军时，途经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同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周恩来说：会前我曾给你商量过，湘江战役时“红章”纵队行动迟缓问题，主要是老弱病残和妇女、机关部分干部走不动了，疲马不畏鞭捶，命令已不起作用。当初老毛和洛甫坚持把他们单独编成野战纵队，还雇了五千挑夫挑担子，一起转移，是考虑欠周。可是现在来追究过江迟缓的责任，而不谈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及长途行军在组织工作上的疏漏，肯定有人不服，所以，我一再向你建议，先代表中央深刻检讨反“围剿”失败及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及责任，最后谈湘江教训，这样会使会议开得顺利些。可是你的讲话对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只谈现象，不检讨

遵义会议史话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军事路线错误，对李德的批评也只一带而过，早早地把湘江问题作为会议重点摆出来，矛头指向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这给了洛甫“开炮”的机会，使会议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以中央军委负责人的身份检讨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责任，承认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批评你确有盲从李德、包庇李德的错误。至于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能挡得住吗？所以你应该想开些，以大局为重，虚心才能团结人，特别是对行伍出身的同志更要尊重。

周恩来接着说：上海起义失败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成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行。南昌起义失败，有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国工农红军要取得胜利，非要有一个比领导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官（包括我自己）更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来领导。广州起义失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

村，必须走农民战争的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是帅才，都不适合做领袖和主帅。毛泽东是继澎湃之后又一个擅长搞农民运动的人，他1927年上罗霄山中段时，才几百人的队伍，占据了两个小山村，一年光景就发展到几千，占据了湘赣边界三四个县城，后来又发展到赣南闽西，形成了湘赣闽苏区。提出的口号很切合农民的心愿，对巩固根据地，扩充红军，筹集粮草，打游击战、运动战都总结出一套成熟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进湘鄂边的错误主张，使我下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毛泽东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



遵义会议陈列馆雕塑

遵义会议史话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毛泽东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博古：现在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握军权，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我们迟早要和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是视军权至上的人。多年来张国焘一直是党内老大，任过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现在能和张国焘相比的只有老毛，他们都是“一大”代表，在“三大”二人交过手，以后都担任过中央领导职务，后来又都领导过一个大苏区，领兵数万。和张国焘会师后，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很难预料，到时候党的主要领导人如何处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能否拿出一个成熟的主见，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确是个重大考验。遵义会议已经表明，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一个不能参与军事指挥决策的书记，犹如一个骑着战马奔驰却由别人拿着缰绳的人，这是多么窝心的事。何况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也不具备吸引群众顶礼膜拜的魅力，心地善良，不会耍政治手腕。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一年多里，在政治路线上总是压抑自己的见解，唯国际指示是从。“福建事变”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招致一些人的非议，使自己处在一个夹缝中。所以说这个“书记”不当也罢。

周恩来的一席谈话，感人肺腑，使博古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解开了十多天来的思想疙瘩，确实“解铃还需系铃人”（1931年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时，是周恩来扶博古上去的）。当晚，中央

政治局常委在一起开会重新研究常委分工时，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来接替博古，但毛泽东说，洛甫（张闻天）是五中全会选出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同时他又是在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共产国际那边也容易通过，虽然他在中央苏区也做过一些错事，但人总是要帮的吗。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由洛甫代替了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红军长征期间，军事工作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洛甫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早在反“围剿”战争时就很佩服和拥戴的，让毛泽东出山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也是他的初衷。再则，洛甫作风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会沾沾自喜，独断专行。这样，毛泽东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会后，周恩来对博古说，这几年你搞组织工作，宣传鼓动工作都很有能力，眼下王稼祥病情趋重，我这个红军总政委急需帮手，你来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意下如何？博古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自此，博古不论在会理会议，还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政治危崖下，为维护和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没有迷失跌宕，谱写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人生篇章。

1945年周恩来在“七大”期间的一次谈话时说道：“鸡鸣三省生百感。”纵观周恩来波澜壮阔的前半生，经历过多少腥风血雨的日日夜夜，惟独对长征途中川黔滇边的这个小村庄念念不忘，百感交集，实在耐人寻味。

遵义会议史话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

□ 禹明先

本文把“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作为一个论题提出来进行探讨，是因为近些年来，人们在研究遵义会议时，往往把四渡赤水的这一过程与遵义会议断裂开来讨论，片面地认为遵义会议仅局限于遵义会址中召开的那三天会议。这种认识和研究方法明显是错误的！因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会议召开、会议决议的形成到传达执行会议决议，调整更改充实决议，再到检验总结肯定遵义会议决议成果，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其中在四渡赤水期间继续会议议程调整充实和传达执行决议过程中，还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和曲折，遵义会议决议差一点被否定而付诸东流。因此说四渡赤水期间是遵义会议议程充实完善贯彻执行和接受检验认可的关键时期，是遵义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与遵义会议断裂开来讨论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具体来说，遵义会议从酝酿发起到总结肯定遵义会议决议，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期间的水潦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通道、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发起和准备阶段，会理会议则是对遵义会议决议的执行成果进行审查总结和认定，从而为遵义会议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关于遵义会议的起因，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讲得很清楚：“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军事路线）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关于通道转兵，伍修权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三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

由此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是通道和黎平会议所决定的。也由此可知，遵义会议实质上是毛泽东革命军事理论路线与李德军事路线的一场公开的面对面的斗争（王稼祥的回忆就说“遵义会议是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一次革命^①，其结果是毛泽东的革命军事路线获得胜利，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史话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自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革命根据地丢失，中央红军被迫实行军事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当时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中央红军的生存问题，只有生存下来，才可能有壮大和发展。而生存的关键是用武力抗拒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的追歼和围剿，因此当时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军事战略路线和军事指挥权问题。如果军事战略路线和军事指挥错误，就将会给中央红军带来灭顶之灾，因此遵义会议只提出解决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而不及政治路线问题（没有根据地，也就无从谈政治路线问题了）。

遵义会议是湘江战役后将它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的。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这场军事路线斗争，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就有所防备。据张闻天回忆，为了根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在中央红军中的影响，以防毛泽东东山再起，最高三人团决定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分散安插到各军团行动，后因毛泽东的反对才未分散。张闻天对此回忆说：“我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但记得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和周恩来）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湘江战役后，现实困难迫使人们回顾毛泽东军事路线在几次反“围剿”中的胜利，期盼毛泽东出来指挥中央红军。李德夫人肖月华曾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湘江战役）红军经受这样惨重的损失，现在又如此陷入困境，我们觉悟到，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除了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恶果，这是仰赖一个外国人李德的恶果。从机关到部队长期以来的怀疑和不满情绪，至此已发展到了顶点。有的在那儿公开骂娘，事情全坏在‘老毛子’（李德）身上；有的在那儿私下议论，要求改换党和军队领导。许多干部战士牢骚满腹地说：‘过去他们（指：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没来苏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我们从没有打过这么窝囊的仗啊’！”（黄克诚在回忆中也有同感）。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也回忆黎平会议时王稼祥对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认识态度说：“当时王稼祥同志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执，他忧虑地对主席说‘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后来，他干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主席听了稼祥同志的话，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些担心，回答说：‘能行吗？我们人少。’稼祥同志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主席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稼祥同志答应了。”王稼祥对此事也回忆说：“我先找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看法，以

遵义会议史话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及召开中央会议的意见，张闻天同志正巧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对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有同感，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周恩来也赞成这一建议。随后，我还找了几位军队的负责同志，谈了我的看法。正好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腿伤感染化脓也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动，我们有机会在一起交谈，我把上述看法和聂荣臻同志谈了，得到他的支持和赞同。”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听说要开会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权，当时的政治局后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他三番五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能得以成功召开，“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凯丰原以为聂荣臻是留苏派，应该可以争取过来，没想到聂荣臻不买他的账。据李卓然回忆：“1935年1月中旬，我在贵州珠场接到周恩来副主席发来的电报，要我迅速赶到遵义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同志就在他的卧室里接见了。他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是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着说：‘怨声载道啰，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另据伍修权回忆，鉴于召开遵义会议，改换错误的军事领导，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以上即是遵义会议的起因。

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召开遵义会议的目的和议程有两

个：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作《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对军事错误做了一定的检讨，但他多数是强调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的错误辩护。博古之后由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对自己应有的军事指挥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其后是毛泽东和王稼祥二人发言。毛泽东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讲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和它在各方面的表现。此时，会场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两条军事路线斗争。毛泽东之后紧接着由王稼祥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之后是张闻天的发言，他批评“博古同志的报告其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也不承认其军事路线在战略战术指挥上的错误”。因此，杨尚昆在回忆中称张闻天的发言报告为“反报告”（反驳博古的发言报告）。张闻天之后是朱德发言，他声色俱厉地批评和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一个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了！”接着李富春、聂荣臻、李卓然等人的发言都猛批李德的错误指挥。会上，除博古和凯丰两人之外，包括周恩来在内大部分发言人都支持毛泽东的观点。由于王稼祥的发言是第一个打破双方相持僵局，公开支持毛泽东的人，为后来支持毛泽东的人的发言开了一个示范性的好头，因此毛泽东后来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

遵义会议史话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的一票！”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处于被批判地位的，由于他的资历和为召开遵义会议的功劳，加上他在遵义会议上对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因此，会议作出以下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总指挥）。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李德）同志完全坚决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A）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决议。

会议最后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精神起草一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从以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可以看出：“决议”对两个重大问题的处理是不明确的。其一、“决议”只说“取消三人团”，没说罢免博古总书记职务，并且博古也“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凯丰也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则是坚决不同意对他的批评。故“决议”对博古职务的去留是暂时妥协保留的，因此“决议”没有明确罢免博古总书记的职务。也由此可见遵义会议是个未开完的会议，从遵义出发到土城战役期间仍由博古任总书记，直到2月5日到叙永县水潦时才由政治局会议免去博古的总书记。故周恩来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人服了。”

其二、“决议”对毛泽东的分工和任用也是不明确的，实际上对毛泽东的任用是限制和压制的。

据王稼祥回忆，遵义会议上是他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并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但如毛泽东会前所预料的反对派势力很大，毛泽东仅是被选入常委而已，职责和分工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只是迎得了发言权”而已。对于决议上对毛泽东的这个限制使用，黄克诚当时就感到有些不正常。因此黄克诚在回忆中说：“我对在最危急的关头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心中非常高兴，感到中央红军又有希望（了）。可是，我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问题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当时我虽然没有讲出来，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考虑了很久也未得到解决……”

毛泽东能在遵义会议上复出，是众望所归的结果。正如伍修权在回忆中说的：“人们在（前几次反围剿）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由于当时军情紧急，遵义会议决议的

遵义会议史话

二零一四年第一期 总第三十七期

